

钱
文
忠
集

天竺与佛陀

钱文忠 著



天竺与佛陀

钱文忠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竺与佛陀 / 钱文忠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36-8396-9

I. ①天… II. ①钱… III. ①佛教—文集 IV. ①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1391 号

书 名 天竺与佛陀

著 者 钱文忠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策划编辑 刘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金龙

特约编辑 史会美

封面设计 灵动视线

出版日期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照 排 灵动视线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640mm × 890mm)

印 张 11.5

字 数 123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8396-9

定 价 32.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建议陈列类别: 社科 作品集

目 录

试论马鸣《佛本行经》 / 1

附录一 陈寅恪先生和《佛本行经》的研究 / 34

附录二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目录 / 38

附录三 缩略语表 / 47

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 / 50

印度学新书选述 / 63

古代印度的现代启示 / 91

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浅谈 / 99

佛教社会功能四题 / 103

读季羨林先生《佛教十五题》 / 109

读饶宗颐先生《梵学集》 / 112

评林梅村教授《西域文明》 / 122

《汤用彤全集》第七卷《读书札记》与“《隋唐佛教史》” / 129

略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 / 136

“三寸丁谷树皮”臆解 / 171

后记 / 174

试论马鸣《佛本行经》

—

周一良先生《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页339—344）略云：

记载释迦牟尼一生事迹的经典中，最早的有后汉竺大力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然后吴支谦译有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有普曜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有过去现在因果经，隋阇那崛多译有佛本行集经，唐地婆诃罗译有方广大庄严经，赵宋法贤译有众许摩诃帝经。这些经典叙述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从释迦族的悉达太子降生叙起，有的从释迦族的祖先叙起。又有的从释迦牟尼前生作婆罗门名叫善慧，遇见燃灯佛初发菩提心讲起。还有的从天地开辟说起。因为传受不同，内容互异，在佛教史的研究上各有其地位。但要从文学眼光看来，以上所举的却不算重要，最重要的两部是刘宋宝云译的佛本行经和相传北凉县无谶译马鸣的佛所行赞。

陈寅恪先生《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页 285—297）略云：

如马鸣所撰佛所行赞，为梵文佛教文学中第一作品。

文忠案，马鸣的《佛本行经》是印度文学诗歌（梵文 Kāvya）的第一部作品，是上承《吠陀》《罗摩衍那》所代表的古代印度咏赞艺术，下启文学诗歌（也有学者把它们称做“艺术诗歌”的，德文 *Kunstdichtung*，关于这一类文学形式的名称及有关的争论，请参见 HCP）的杰作。在马鸣之后约三四百年出现了著名诗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印度诗歌以他为标志而达到了巅峰，在人类文学史上光彩四溢。《佛本行经》主要叙述了佛陀从诞生到涅槃一生的经历，又可以当做释迦牟尼的传记来读，所以，对于佛教史的研究也有其重要意义。《佛本行经》曾经被广泛传颂，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和中国中古文学又有很大的关系，陈寅恪、饶宗颐先生早已有所论列。

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也把《佛本行经》看做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凡是有关印度文学史、佛教史的论著，几乎都辟有专章，请参见 HIL, Vol. 2, pp. 246—265；IKH, §§709—714, HCP, pp. 33、132、164；IB, pp. 133—137；JB, Vol. 2, 《导论》；山田龙城《梵語仏典の諸文献》（平乐寺书店）“11 仏伝文学”。

可惜的是，我国学者对《佛本行经》没有能够深加考究，国外学者也几乎没有人做过不同系统的写本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没能够总结出各写本之间的关系和传受。本文试图在这几个方面以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做一些尝试，以求教于方家贤者。

本文得以写成，要感谢季羨林师，德国汉堡大学的 Prof. Dr. A. Wezler、Prof. Dr. L. Schmithausen、日本东北大学的菅原泰典君，

日本京都大学的室寺义仁君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仅缺乏资料，恐怕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一艰难的课题，我会望而止步，丧失对某些极为复杂的问题进行本领域中第一次尝试的信心。

二

《佛本行经》(Buddhacarita)的作者马鸣(Aśvaghōṣa)在他现存的所有作品中，对自己的身世缄口不语。大凡对印度历史稍有涉猎的人，都会感觉到，印度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他死后不久或者甚至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被神化了，神格于是就堆积在人格之上，乃至传奇蜂起，而他们的真实经历却不是被人遗忘就是恍惚迷离，竟至莫可究诘。如果想确定他们的绝对年代几乎毫无可能，即使是通过与他人或作品参照比较后得出的相对年代，也可以上下百年甚至于千年。这已成为一条通例，马鸣也不能例外。

对马鸣年代的估计，全凭对《佛本行经》的艺术类型、词汇特征及内中所涉及的人物故事进行耐心研究。当然，也有人应用其他办法，比如吕德斯(H. Lüders)在名著《佛教戏剧残卷》(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1911)的页11里曾分析了中亚出土的马鸣《舍利子剧》(Śāriputraprakaraṇa)的字体，他认为这个残卷是在迦腻色迦或胡毗色迦之际抄就的，这实际上推测了马鸣生存年代的相对下限。但是，琼斯頓(E. H. Johnston)有不同看法，他在JB. pp. XV—XVII中说：

现存作品的内在证据使得其是否写于贵霜帝国内

颇成问题。……诗人应生活于迦腻色迦后不久或早于迦腻色迦。……其风格证明他生活在迦梨陀娑前数世纪；其词汇似距憍蒂利耶 (Kauṭilya) 的《利论》(Arthaśāstra) 不远。绝大多数学者置马鸣于公元 1 世纪 75 年顷，无人把他置于 2 世纪 25 年之后。……诗人应稍早于迦腻色迦，或应注意诗人生活年代的上限由《佛本行经》末章中提及的阿育王传说而限定。

据此，马鸣的生活年代大致上为公元前 50 年至公元 100 年，这个判定当不致大错。

琼斯顿所用的三个写本上都有题记，里面都说马鸣是“Sāketaka”。这个字是由 Sāketa 加后缀 ka 构成的，此云“莎积多人”，由此看来，马鸣似乎是出生于此地了。

比玛腊·朱恩·劳的《古代印度的历史地理》(Bimala Churn 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New Delhi, 1976) 页 122—123 “Sāketa” 条下说：

它是北拘舍罗的首府，波颠闍梨 (Pantañjali) 在《大疏》(Mahābhāṣya) 中首次提及此地。在印度六大城市中，它地位显要（《长阿含》II. 146）；《本生经》中也把它当做一个重要城市，包括佛陀在内的许多名人曾莅临此地。

《西域地名》“Saketa” 条下说：

《佛国记》沙祇大国，《水经注》卷一作沙祇国，《孔

雀王经》僧伽婆罗译本作莎积多国，义净译本作娑鸡多或娑鸡覩。《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沙祇大国，即舍卫国也。”此说不太正确。沙祇应为 Ayodhya 地，其领域当以 Ayodhya 为中心，包括闍伽夷（Kanyakubja）东南，舍卫城（拘萨罗国）南部一带之地。

《法显传》（章巽先生校注本）“沙祇大国”下略云：

从此（指呵梨——文忠注）东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国。

出沙祇城南门，道东，佛本在此嚼杨枝，刺土中，即生长七尺，不增不减。诸外道婆罗门嫉妒，或斫或拔，远弃之，某处续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经行、坐处，起塔故在。

这段文字的大意还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五、《大唐西域记》（季羨林师等校注本）卷五“鞞索迦国”条下：

说法侧有奇树，高六七尺，春秋递代，常无增减，是如来昔尝净齿，弃其遗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诸邪见人及外道众竟来残伐，寻生如故。其侧不远，有过去四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复有如来发爪窠堵波。灵基连隅，林沼交映。

由于两段文字极为相似，所以有人认为鞞索迦国就是沙祇大国，然欤否欤？恐怕只有存疑待考了。考法显之履印土，与鸠摩

罗什译《马鸣菩萨传》相距不远，揆以常情，法显至少是应该听说过马鸣这个名字的。玄奘也这样。但法显不仅在“沙祇国”下不置一词，而且全书中也无道及马鸣之处。玄奘虽然提到了马鸣，但也没有提供有关他出生地的确切证据。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怀疑这些年代很晚的题记中 Sāketaka 一字的权威性。

题记中还说，马鸣是金眼 (Suvarṇākṣī) 的儿子，这恐怕是无可深究的了。

马鸣在皈依佛教之前曾受过极深的婆罗门教育。在《佛本行经》中，凡是论及婆罗门的语句，语气都十分恭敬。像“梵仙” (brahmaṛṣi) 这样的字屡见不鲜。马鸣著作中梵文的优美和规范，也不是其他的佛教大师所能望其项背的。汉文的《马鸣菩萨传》(《大正新修大藏经》2046号) 虽然有点不经之谈，但是它里面讲到的马鸣被一名“远大疑非常人”的长老胁降服为弟子的事情明显是有一定根据的。温特尼茨 (M. Winternitz) 和恩默瑞克 (R. E. Emmerick) 倾向于把《马鸣菩萨传》贬得一无是处，这看来是不正确的，下面还要谈到。

马鸣是一个佛教徒，从无疑议；但是，马鸣究竟属于哪一个部派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从《马鸣菩萨传》里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属于说一切有部，琼斯頓通过对马鸣著作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把他归于多闻部或多闻部的亲缘学派鸡胤部；松涛诚廉归之于瑜伽行派；金仓圆照归之于经量部；渥德尔 (A. K. Warder) 在他的《印度佛教史》中，在正文里据琼斯頓的意见把马鸣归入了多闻部，但在附录里又似乎别有他据，把《佛本行经》归入法藏部著作之中，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没有新材料，恐怕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鸣的学说并不囿于一宗一派；他所归属的学派应该和他的行迹有关系。关于前

一点，可参见本庄良文 1987 年发表的《马鸣诗歌中的经量部学说 (1)》。

马鸣一生，尤其是皈依佛门之后的行迹，是和西北印度、中亚大有牵涉的。《马鸣菩萨传》略云：

王（月氏王，不知何指——文忠注）审知比丘高明胜达，导利弘深，辨才说法乃感非人类。……饿七匹马至于六日旦，普集内外沙门异学，请比丘说法。诸有听者莫不开悟。王系此马于众会前，以草与之，马垂泪听法，无念食欲，于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马解其言故，遂号为马鸣菩萨。

这段神话般的文字中包含着一些真实的情况，就是马鸣不是本名，而是得之于月氏的一个“绰号”。

《大唐西域记》卷五也把“马鸣遗迹”系于“摩揭陀国上”之下。此段文字之前有一个“击榼椎”的故事，与《马鸣菩萨传》中所记的几乎完全相同。

恩默瑞克在他为《剑桥伊朗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所撰写的第二十六章《伊朗民族中的佛教》（*Buddhism among Iranian Peoples*）中说道：

将迦腻色迦同著名佛教作家马鸣、母奴（*Mātṛceta*）、世亲（*Vasubhandu*）以及著名物理学家迦罗迦（*Caraka*）联系起来的传说，几乎没有价值。

在他为《宗教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 M.

Eliade, New York, 1987) 撰写的词条“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中亚佛教)”中,他又重复了上面的论点。

在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国西藏的记载说,马鸣和一位名叫迦腻迦的国王有交往。

多罗那他(Tāranātha)《印度佛教史》第十八《马鸣阿闍梨等时代》中说:

摩唎制咤阿闍黎晚年,频头莎罗王弟弟的儿子室利旃陀罗王在位,造一观世音殿,养着两千说大乘法的比丘。罗睺罗贤作吉祥那烂陀寺的首座,在那里兴建十四座净香殿,也设立不同的法产十四处。室利旃陀罗王在位多年,西方提利(英译本谓即德里)与摩腊婆国有个年轻的迦腻迦王即位,新开宝矿二十八处,非常富足。在四方各建一所庙宇,经常供养大小乘比丘各三万人,因此须知迦腻色迦王与迦腻迦并非一人。

摩唎制咤阿闍黎即是上文略略提到过的难胜黑婆罗门。他的异名有毗罗、马鸣、摩唎制咤、比唎制咤、难胜、达弥迦须菩提与摩底唎多罗等。

这里的摩唎制咤即是母奴的梵文音译,达弥迦须菩提也是名满一时的梵语作家。那么,这一段记载说的是马鸣呢还是母奴?从下文谈及的他的著述情况来看,应当说的是母奴,但从由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过程和情节来看,又应当说是马鸣。真可谓是扑朔迷离,雌雄难辨。据渥德尔《印度诗歌文学》(Indian Kāvya Literature) § 885,母奴是龙树(Nāgārjuna)的弟子圣勇(Ārya Deva)的学生,而马鸣要略早于龙树。所以,从此书的章节顺序

来看，第十五章是《圣者龙树护持教法时代》，这里谈的应该是母奴。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历史感不强的藏文记载通常是因袭几乎毫无历史感的印度记载的，而且多罗那他圆寂于1634年（参见王尧先生《张译〈印度佛教史〉读后赘语》），年代较晚，所以这一重公案远远没有解决。这里特地拈出，以求教于精通藏学的师长。

无论如何，多罗那他的记载提供了至少两条非常有用的参考信息。一是迦腻迦问题；二是母奴，或者是马鸣，到过摩揭陀。马鸣和中亚的关系，不仅从他著作的语言特征中可以窥见，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归于马鸣名下的著作非常之多，可以确定的却只有在中亚都有残卷出土的三种，即《佛本行经》、《美难陀传》(Saunda rananda)、《舍利子剧》(Śāriputraprakaraṇa)。有争论的有，《苏摩达多》(Somadatta)、《罗尸吒罗婆勒》(Rāṣṭrapālā)、《金刚针》(Vajrasūcī)、《犍椎梵赞》(Gaṇḍīstotra)、《经庄严论》(Sūtrālamkāra)。

三

由于马鸣的美誉和《佛本行经》（关于汉译名称的问题下面会谈到）的名声，我国的僧侣早就对此加以注意，并进行了记载。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先生校注本，尚未刊）卷四“赞咏之礼”条下云：

又尊者马鸣亦造歌词及《庄严论》，并作《佛本行诗》，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官，终于双树，一代佛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

而摄义能多，复令诵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

这段记载中的“五天南海”应该是和义净的行踪相吻合的。可见《佛本行经》不仅往北而且也往南广为传播，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作品”。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没有提及马鸣的作品，但是描绘了摩揭陀国的马鸣遗址。

也许由于《佛本行经》本身更多的是一部舶来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纯粹的诗歌作品，但它不是一部经院气味很浓、寺庙气味很浓的佛教哲理经典，因而虽然它一直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作为中国佛教学者主体的僧侣和居士对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甚至于它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最明显的痕迹还只能在中古史上最著名的排佛人物韩愈的一首诗歌中被窥见。

直到20世纪初，《佛本行经》才又一次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胡适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1922年2月22日下记云：

上课，为钢先生译述两时。他说，锡兰佛典（Canon）的结集约在B. C. 三〇〇，而当时尚无释迦的传记。最早之传记为无名氏的Lalitāvistara——西晋竺法护译为《普曜经》，唐地婆诃罗（Divākara）译为《方广大庄严经》——及马鸣（Avaghoṣa，应作Aśvaghōṣa——文忠注）做的Buddhacarita，隋闍那堀多（Jñānagṇpta，应作Jñānagupta——文忠注）译为《佛所行赞经》。此两书约成于西历第二、三世纪——汉魏之际。一切“本行”的

经皆自此二经演申出来。

此段日记是我国现代学者专论《佛本行经》的第一例。日记显然是钢和泰 (Stael-Holstein, Alexander von) 上课讲义的复述, 文不过二百字而谬误迭出, 可见当时的钢和泰和胡适对《佛本行经》实在没有过深的研究。

真正深入而科学地研究《佛本行经》的, 陈寅恪先生实为我国第一人。他在《论韩愈》中说:

寅恪昔年与钢和泰君共读此诗, 取中文二译本及藏文译本比较研究, 中译似尚逊于藏译, 当时亦引为憾事, 而无可如何者也。

可见陈寅恪先生所应用的方法十分科学, 关于详细情况请参阅本文附录《陈寅恪先生与〈佛本行经〉的研究》。

陈先生并没有专论《佛本行经》的文章, 而先生的高足周一良先生却对《佛本行经》作出了巨大的却鲜为人知的贡献。周先生干净彻底地解决了上千年来一直被人忽视的重要问题: *Buddha-carita* 的汉译本到底是什么名称? 汉译者究竟是谁?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本缘部 192 号题“佛所行赞卷第一, 亦云佛本行经。马鸣菩萨造。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讖译”。193 号题“佛本行经卷一, 一名佛本行赞传”。据此, 似乎 192、193 号应当是同本了, 但稍加比较, 我们就必须否定这种看法。这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 周先生《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略云: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有“佛所行赞五卷”, 注云

“一名马鸣菩萨赞，或云佛本行赞”。译者是刘宋时宝云。（参看卷一五宝云传。）卷四又有“佛本行经五卷”，在失译杂经录里，就是说不知道译者。隋法经的众经目录卷二有“佛本行赞经传七卷，宋元嘉年宝云译”，又有“佛所行赞经传五卷，一名马鸣赞，晋世宝云译”。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九有“佛本行经五卷”，是昙无讖译。卷一〇有“佛所行赞经五卷”，宝云译。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和三宝记相同。武周时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五大乘重译经目中有“佛本行经一部五卷”，昙无讖译，又有“佛本行经一部七卷”，宝云译。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四昙无讖译经有“佛所行赞经传五卷”。注云：“或云经，无传字。或云传，无经字。马鸣菩萨造。亦云佛本行经，见长房录。”卷五宝云译经有“佛本行经七卷”，注云“或云佛本行赞传，于六合山寺出。或云五卷，见僧佑宝唱内典等录。高僧传云佛本行赞经”。

情况复杂成这个样子，周先生选择了四部可靠的经录，将其中有有关的记载排列成表，得出结论说：

我们知道从梁代到唐初，一直认为宝云所译的叫做“行赞”，另一部叫“行经”，这个最早的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换言之，就是现在的“佛本行经”原名该是“佛所行赞”，而“佛所行赞”该是“佛本行经”。

周一良先生进一步讨论了 *Buddhacarita* 的 *carita* 的意义，它没有“赞”的意思，又以今本《佛本行经》文体风格大类“赞体”